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 格局的演进^[1]

孙德刚 章捷莹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在安全层面，大国在中东发动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东矛盾不再是全球主要矛盾；地区国家关系出现了缓和态势，从对抗走向对话，寻求建立更加稳定、均衡和普惠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在政治层面，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美俄的盟伴竞争使中东国家成为“新中间地带”，但大多数国家不愿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在能源层面，俄欧博弈使中东国家从以往对亚洲能源出口“一边倒”，转向与亚欧能源消费大国同时建立合作关系的“东西并重”。在科技层面，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与华脱钩、断供，但中东国家反对科技议题政治化，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

【关键词】大国竞争 中东格局 战略自主 能源转型 大国平衡

【作者简介】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章捷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2-0029-23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治理的大国作用与影响研究”（22JJD810024）的阶段性成果。

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百年变局下，大国矛盾上升为全球主要矛盾，大国间互动范式从战略协调转向战略博弈，地缘竞争、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是当前大国战略竞争的三大重点领域。^[1] 大国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对地区格局的演进具有深远影响。

乌克兰危机以来，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策应大国战略竞争。美国通过在中东制造对立、使经济议题安全化，试图把俄罗斯、中国、伊朗、叙利亚等非西方国家刻画成“挑战现状的修正主义集团”，将中东纳入大国竞争的轨道。拜登政府积极拼凑“阿拉伯版北约”，打造“中东防空联盟”，组建美印以（色列）阿（联酋）“四方机制”（I2U2），强迫中东盟友与西方世界步调一致地在政治和能源领域制裁俄罗斯、遏制伊朗和叙利亚；在科技领域，美国拉拢中东国家与中国“脱钩”。面对能源供应危机，欧洲大国也在中东积极找寻替代者，以应对与俄能源脱钩、断供的影响。因此，大国竞争在中东呈现出三组关系：美俄博弈以伙伴竞争为主，俄欧博弈以能源竞争为主，中美博弈以科技竞争为主。

近年来，中东国家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从本国利益和外交理念出发制定政策，推动中东冲突降温降级。因为它们认识到，因循西方安全观和国家组织架构发展，中东地区将永无宁日；将自身安全寄望于美国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从对抗到对话：大国战略收缩下中东地区的“和解潮”

中东历来被称为“埋葬帝国的坟场”和全球冲突的“火药桶”。“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俄、欧积极介入中东安全事务，大打代理人战争，一时间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等都成为大国代理人战争的前沿阵地。受域外大国推波助澜、争夺势力范围的影响，中东地区出现

[1]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85页。

了权力极化，形成了以沙特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联盟”、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抵抗联盟”和以以色列为代表的“温和联盟”等多个力量中心。^[1] 沙特等国与伊朗的对抗，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的对立，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对峙，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亲美派与亲俄派的针锋相对，导致中东长期陷入群龙无首的霍布斯状态，各国间战略互信低、合作意愿弱，是全球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中东安全也因此被三组矛盾所捆绑：域外大国在中东的“谋霸与反霸”矛盾；中东国家内部的“结盟与反结盟”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与合”矛盾。

2021年以来，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世界大国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对中东安全事务的关注度下降，为中东国家内部关系的缓和开启了难得的窗口期。随着美国从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撤出主要力量，加之俄罗斯从叙利亚和利比亚减少军事存在以及欧洲大国减少在环地中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中东强国逐渐成为地区事务的主角，日益发挥积极塑造作用，推动中东地区涌现“和解潮”。^[2]

首先，阿拉伯、土耳其和以色列三边关系回暖

其一是土阿关系。“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支持亲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而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形成了“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与域外大国关系盘根错节。2018年，因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土耳其和沙特、阿联酋等关系急剧紧张，东地中海天然气争端更令土耳其与埃及关系雪上加霜。直到2021年11月，土阿关系才迎来路转峰回——时任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Khaled bin Mohamed bin Zayed）访问土耳其，宣布成立100亿美元基金

[1]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46页。

[2] Burhanettin Duran, “Türkiye and the Future of Norm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sight Turkey*, Vol.24, No.2, 2022, p.163.

用于支持对土投资。2022年2月和4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时隔多年分别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并与阿联酋签署了13个合作协议，涉及经贸、能源、防务等多个领域。^[1]同年6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回访土耳其。高层的频繁互动标志着土阿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伴随土耳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回暖，土耳其与埃及也于2023年3月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其二是土以关系。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2010年，以色列国防军强行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造成多名土耳其公民丧生，两国因此爆发外交危机。后因埃尔多安政府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反对以色列军事霸凌，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土耳其多次召回驻以大使。随着域外大国从中东抽身，土以关系也逐渐升温。2022年3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时隔14年访问土耳其；9月，埃尔多安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拉皮德（Yair Lapid）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闭门会晤。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高层往来，凸显土以关系在加速改善。

其三是阿以关系。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先后爆发五次中东战争，阿以矛盾长期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自2020年9月以来，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2022年3月，以色列首次作为东道主邀请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举行会晤，六方决定成立“内盖夫论坛”，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同年6月，六国高级外交官齐聚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了该论坛的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2]2022年以来，以色列高层领导人更频繁造访阿联酋、阿

[1] 金良祥：《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6期，第142页；Galip Dalay, “Turkey-UAE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eopolitical Incompatibility,” <https://www.cats-network.eu/publication/turkey-uae-relations-economic-cooperation-against-the-backdrop-of-geopolitical-incompatibility>。

[2] 《以色列内阁批准成立“内盖夫论坛”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光明网，https://world.gmw.cn/2022-09/19/content_36033599.htm。

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

其次，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出现改善势头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受教派矛盾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长期紧张。特别是由于2015年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奈米尔（Sheikh Nimr al-Nimr）引发海湾外交危机后，沙特、苏丹、巴林等国宣布与伊朗断交，阿联酋、科威特宣布与伊朗外交关系降级。2021年以来，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油轮等多次遭袭，美国对此不仅未能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还从沙特撤出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不能不让海湾阿拉伯国家心存疑虑，担心遭到抛弃，因此选择同伊朗展开务实的安全对话和外交谈判。2022年以来，双方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科威特和阿联酋相继与伊朗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沙特与伊朗在伊拉克举行五轮直接会谈，并在阿曼就也门问题展开磋商；阿联酋重新向伊朗派驻大使，并对伊朗投资3亿美元；2022年2月和5月，伊朗总统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Tamim bin Hamad Al Thani）成功实现互访。^[1]2023年3月，在中国的成功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宣布复交，更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缓和，伊朗与阿联酋、巴林关系进一步密切，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内部教派紧张关系也出现转圜。

第三，阿拉伯国家内部初现和解曙光

22个阿拉伯国家国情和资源禀赋不同，对外战略差异甚大。亲美与反美阵营、亲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亲伊朗与反伊朗阵营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内部三组主要矛盾。“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有别于俄罗斯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美国、欧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则瞩目于推动叙利亚政权实现更迭。因美、俄、欧羁绊于乌克兰危机而无暇旁顾，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趋向缓和。2022—2023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Bashar al-

[1] “Qatar Emir Visits Iran as Nuclear Talks Falter,” *The Gulf News*, May 12, 2022, <https://gulfnews.com/world/mena/qatar-emir-visits-iran-as-nuclear-talks-falter-1.87808611>.

Assad) 多次访问阿联酋; 2023年, 沙特与叙利亚宣布复交; 叙利亚外长亦受邀访问埃及, 阿盟大家庭发出重新接纳叙利亚的信号。2023年2月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大地震之际, 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均施以援手, 对叙开展地震外交, 对叙政策从遏制转向接触。

在西撒哈拉主权问题上, 俄罗斯曾长期力挺阿尔及利亚, 美欧则普遍支持摩洛哥, 阿摩两国因该问题而于2021年断交。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美、俄、欧介入西撒哈拉事务的意愿减弱。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则趁机主动向阿尔及利亚示好, 建议两国恢复邦交。^[1]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也一度四分五裂。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穆尔西政府、巴勒斯坦哈马斯形成了事实上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 与沙特、巴林、阿联酋等国的“传统伊斯兰联盟”针锋相对。2017年, 沙特、埃及、巴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直到2021年初双方才恢复外交关系。2022年卡塔世界杯期间, 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高层互动频繁, 海湾阿拉伯国家展现出团结姿态。

受域外大国对中东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 中东长期是全球和平最为脆弱的地区。中东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和教派矛盾一度外溢到非洲、中亚和欧洲地区。地区国家关系缓和后, 其内部安全困境亦有所缓解, 对外参与全球事务的积极性随之提升, 从冲突的输出国变成了和平倡议的发起国。2022年3月, 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和埃及四国外长与阿盟秘书长一道, 成立“阿拉伯接触小组”并访问莫斯科, 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2] 土耳其在俄乌之间开展外交斡旋, 为两国农产品出口开辟绿色通道, 同时有意将自

[1] “King Mohammed: Morocco Ready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Algeria,”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2/07/350557/king-mohammed-vi-morocco-ready-to-normalize-relations-with-algeria>.

[2] “Ukraine-Russia Conflict: Algerian Action and African Inertia,” *LE Journal Del Afrique*, April 4, 2022, <https://lejournaldelafrique.com/en/conflict-ukraine-russia-algerian-action-and-african-inertia/>.

身打造成全球天然气供应中心。在俄乌交换战俘问题上，沙特也发挥了积极的斡旋作用。

地区安全形势趋缓，中东国家加入地区组织的意愿亦随即不断增强。2022年1月，伊朗议会高票通过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法案，迈出“入群”关键一步；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巴林和科威特等申请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沙特、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也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愿望；阿联酋和埃及相继成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会员国。2022年9月，中亚五国外长访问沙特，与海合会外长举行了首届海合会—中亚战略对话，意在促进中东与中亚的互联互通。^[1]2022年12月20日，第二届巴格达合作与伙伴关系会议在约旦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伊拉克总理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等与会。此次会议致力于深化区域合作，且有助于伊拉克实现和平与发展。“和解潮”有望推动中东国家走向区域一体化。

二、从依附到自主：中东与大国互动态势的新变化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上升，中东成为战略板块和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美、俄、欧各大国减少在中东军事存在的同时，扩大外交投入，加大战略竞争力度。在中东的大国战略竞争突出表现为美俄的盟伴竞争、俄欧的能源竞争以及中美的科技竞争。中东国家则在大国间坚持战略自主，实施对冲政策。

（一）美俄在中东的盟伴竞争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2022年发表的报告称，中国已连续多年超过美国，成为中东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投资者，其崛起削弱了美国

[1] “GCC & Central Asi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 in Riyadh,” *Middle East Briefing*, September 12, 2022.

中东联盟体系的凝聚力；俄罗斯向美国的敌人伊朗售武，破坏了中东局势稳定，俄罗斯向美国的中东伙伴埃及和土耳其等售武，造成了美国与中东盟国关系紧张。因此，与中俄开展战略竞争是美国安全政策的首要任务。^[1]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在中东的政治博弈升级，由霸权护持到霸权争夺，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美国根据各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立场重新界定盟伴，不愿意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就意味着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如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与乌克兰断交；伊朗莱希政府升级与俄关系，并向俄提供军用无人机，均被美西方视为逾越红线之举，已成为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共同敌人。2021年11月，美国与海合会官员齐聚利雅得，发表“伊朗工作小组联合声明”，重申要在美国与海合会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就伊朗问题展开磋商，并谴责伊朗采取侵略和冒险政策。^[2]

为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美国在中东积极构建安全-政治-经济的“复合联盟”。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拜登政府一改之前的价值观外交，积极修复与中东盟伴的关系，旨在筑牢反俄反伊朗统一战线、争取盟友的政治支持。2022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与以色列、阿联酋、巴林等国外长会谈，在伊核问题、俄乌冲突等问题上寻求支持，并成立“内盖夫论坛”。美国有意通过促进阿拉伯盟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将中东盟伴串成一条“珍珠链”，从波斯湾到红海，从黑海到地中海，以遏制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哈马斯的“准联盟”。5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亲率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中情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等高官访问阿联酋，以最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前总统哈利法的葬礼，借此增强美阿关系的韧性。同年7月，拜登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沙特，力推“中东版北约”，这也是拜登就任总统后首访中东。

[1] *Renewing U.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RAND, 2022, pp.22-26.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GCC Iran Working Group Statement,” November 17, 2021, <https://www.state.gov/u-s-gcc-iran-working-group-statement/>.

拜登在沙特吉达出席美阿峰会时，强调美国不会离开中东，不会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填补权力真空，也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1]

美俄在中东的盟伴竞争表现为多边制度竞争。制度往往具有非中性的特点，赢得竞争意味着自己将能制定规则，而落败则意味着失去了规则制定权并且要遵守他人的规则。在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行为体在制度创设的初始优势很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2]为同俄罗斯争夺盟伴，拜登政府采取了以下制度化措施：一是强化“中东战略联盟”，与海合会、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等9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美阿峰会”；二是以“内盖夫论坛”为平台，构建“中东防空联盟”，形成美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三角”；三是完善美印以（色列）阿（联酋）西亚“四国机制”，将中东和印太盟伴连为一体。尽管西亚“四国机制”强调在经贸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如阿联酋在印度投资20亿美元建设食品工业园，美国和以色列则提供技术以帮助项目实现长期化；在印度古吉拉特邦推进一个具有300兆瓦风能和太阳能容量、价值3.3亿美元的混合可再生能源项目，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为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资金，阿联酋则提供关键知识和投资方面的支撑；在印度建立芯片代工厂等——但这些投资背后，其地缘政治意涵不言而喻。^[3]

在竞争盟伴过程中，美国鼓励印度在中东发挥关键作用，以稀释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在中东拥有重要的地缘经济利益，仅在海湾地区就有超过800万侨民。2022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访问阿联酋；7月，美、印、阿联酋和以色列举行“四国机制”领导人线上会议，宣布将加强水资源、能源、交通、太空、卫生和

[1] “Biden: US is Committed to Ensuring Iran Never Gets Nuclear Weapon,”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16, 2022.

[2]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98页。

[3] “What is the I2U2?”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22.

粮食安全等方面合作。2023年初，埃及总统塞西作为主宾参加了印度“共和国日”的庆祝活动。在美国的撮合下，2023年2月，阿联酋、法国、印度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达成三方合作倡议并公布实施路线图。声明称，该倡议将有助于推动三方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印度既加入了美国主导的 I2U2 和 QUAD，又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超脱与灵活，其政治大国地位不断提升。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东成为俄罗斯“外交突围”的重点地区，俄积极寻求中东国家的支持，鼓励其奉行“中立不反俄”政策，与美国形成对冲。2022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三度到访中东，足迹遍布阿尔及利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与海合会六国举行外长会，在“欧佩克+”框架下与中东产油国合作，通过利益捆绑阻止中东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选边西方国家。2022年7月，“美阿峰会”刚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踏上中东土地，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参加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领导人“德黑兰峰会”，就叙利亚阿斯塔纳进程举行第七次会谈。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中东战略具有多重目标：一是迫使美国承认其平等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二是在叙利亚已有军事基地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在埃及和利比亚建立军事存在，打破北约在沙姆地区和东地中海南部的垄断地位；三是加强与伊朗的战略伙伴关系，修复与土耳其的合作关系，建立伙伴关系网。^[1]

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和伊朗、叙利亚“抱团取暖”，安全伙伴关系不断升级。2022年1月，伊朗总统莱希访俄，向普京总统提交了一份为期2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草案。俄伊两国均遭受美西方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金融封锁，被迫从“背靠背”到“面对面”。俄宣布对伊朗能源项目投资400亿美元，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并在俄境内生产伊朗无人机。

[1] Wojciech Michnik, “Great Power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en/commentaries/great-power-rivalry-in-the-middle-east/>.

伊朗境内的“拉什特-阿斯塔拉铁路”（Rasht-Astara Rail Link）是俄投资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是7200公里“国际南北货运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STC）的关键组成部分。^[1]

（二）俄欧在中东地区的能源竞争

一直以来，中东被视为欧盟的“后院”，是欧洲大国遏制俄罗斯南下的重要屏障。法国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曾提出“地中海联盟”计划，试图将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中东国家纳入欧盟的战略轨道。“阿拉伯之春”后，数百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欧洲国家视中东为“洪水猛兽”，欧盟与中东一体化进程因此裹足不前。

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中东与亚洲各大国之间，均存在业已形成的稳定能源供应链。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2020年，俄48%的原油、72%的天然气出口至经合组织（OECD）中的欧洲国家。2021年，欧盟24.8%的进口原油和39.2%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俄罗斯。^[2]同样，中东国家70%左右的油气产量都销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

2022年以来，乌克兰危机与欧洲能源危机相互叠加。欧洲大国在能源问题上坚持“去俄罗斯化”，将眼光再次投向美国和中东，希望通过加强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英国甘当反俄急先锋，虽然有8%的石油进口来源于俄罗斯，但仍不惮宣布2022年底前停止从俄进口原油。因此，日产原油1300万桶的沙特和阿联酋就成为重要的替代伙伴。2022年3月，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访问阿联酋和沙特，商

[1]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STC),” August 2, 2022, <https://journalsofindia.com/international-north-south-transport-corridor-instc/>.

[2] 刘冬：《变迁中的国际能源秩序与中东的角色》，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42页。

讨从海湾增加石油进口、应对能源安全的问题。^[1]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阿尔及利亚，修复两国关系，以加强天然气合作，这也是2017年以来马克龙第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9月，德国总理舒尔茨(Olaf Scholz)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并与卡塔尔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天然气和氢气。

在政府引导下，欧洲主要能源公司也终止与俄能源合作，将业务转向中东。阿尔及利亚国有石油公司(Sonatrach)宣布将通过跨地中海油气管道加大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年出口量从100亿立方米增加至220亿立方米，以缓解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2]2022年9月，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价值14亿美元的阿南部伯克金盆地(Berkine Basin)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同年12月，法国道达尔公司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宣布联合投资110亿美元，在沙特建设世界级石化项目。此外，美国雪弗龙、意大利埃尼、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能源巨头也相继与伊拉克展开油气投资项目的谈判。^[3]2022年6月，约旦主办首届“中东北非-欧洲能源论坛”(MENA-Europe Energy Forum)，与会各方强调要加强能源合作，建立能源伙伴关系，形成新的能源供应链。^[4]

与此同时，俄罗斯利用“欧佩克+”机制，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合作，以能源利益共同体为纽带鼓励中东国家奉行中立政策。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飙升，2022年上半年原油价格一度超过100美元/桶，各产油国财政状况也因此大大改善，海湾阿拉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不

[1] “Johnson Visits Saudi Arabia and UAE to Address Energy Prices,” March 16, 2022,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gulf/2022/03/16/UK-PM-Johnson-arrives-in-UAE-ahead-of-Saudi-visit>.

[2] Jeune Afrique, “Ukraine-Russia: Algeria Ready to Provide more Gas to Europe,” *The Africa Report*,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180206/ukraine-russia-algeria-ready-to-provide-more-gas-to-europe/>.

[3] 刘冬：《变迁中的国际能源秩序与中东的角色》，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42—47页。

[4] “MENA Energy Forum 2022- Self-Reliant Europe,” October 5, 2022, <https://menafin.com/1104971731/MENA-Energy-Forum-2022-Self-Reliant-Europe>.

断增加。中东各国从以往寻求大国支持的“小兄弟”变成了大国竞相拉拢的“战略伙伴”，其政治地位大幅提升。

中东产油国在俄欧能源博弈中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实施大国平衡战略。面对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变化，中东产油国在满足亚洲能源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欧洲的能源合作，弥补欧洲国家对俄油气禁运而产生的缺口。中东产油国以能源供应为筹码，坚持战略自主，反对大国胁迫。为维护能源价格稳定，2022年10月，沙特、阿联酋等无视美西方“警告”，宣布“欧佩克+”石油日产量减少200万桶，公开对美国说“不”。^[1]

（三）中美在中东的科技竞争

在与俄罗斯展开地缘竞争的同时，美国积极加强对华科技遏制力度。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到身份焦虑。在美国看来，中国建立了强有力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将军事、外交、经济和技术等手段融为一体，在大国战略竞争中使用组合拳；利用大型国有企业拓展国际业务，补贴国家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通过军民融合使中国实体与军事、情报和安全部门共享技术和信息，对西方形成不对称竞争优势。因此，美国必须联合英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盟国，在科技领域遏制中国。

美国罔顾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通过立法与组建科技联盟两种手段遏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强调维护“美国安全”和加强“世界领导权”。^[2]2020年6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将华为和中兴列为国家安全威胁，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Ajit Pai）还危言耸听地指出，这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及军方有

[1] “Saudi Arabia and UAE Leaders ‘Decline Calls with Biden’ amid Fear of Oil Price Spike,” *the Guardian*, March 9, 2022.

[2] 孙璇：《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策略与大国科技竞争格局》，载《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6期，第173页。

密切联系，与之合作将给美国通信基础设施带来脆弱性。^[1]美国组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等官僚机构，出台《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改革法》《出口管制改革法》《安全设备法》等，以配合中美科技竞争。^[2]2021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强调通过组合手段同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5年内在高科技、产业链等领域投入2500亿美元，确保美国在新兴技术和产业的领先地位。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旨在增强美国竞争力并与中国进行抗衡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3]2022年12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为由，将36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涉及航空、化学制品、计算机芯片等多个领域。^[4]

在国际上，美国积极组建遏华科技联盟。2021年2月，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民主国家”必须制定针对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行为规范的管理规则，从而“使这些新技术促进人的提升而不是受到压制”；美国政府和企业还提出建立“T12技术民主多边联盟”。^[5]美国智库也为构建科技联盟建言献策，主张创建科技联盟，以对抗中国的“数字专制”，维护西方国家的科技领先地位，并强调由“自由民主国家”塑造新兴技术的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6]美国试图通过以上举措，

[1] James Lee1 and Richard Maher, “US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usiness and Politics*, No. 24, 2022, pp. 341–342.

[2] 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136–147页。

[3] 陈淑梅：《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与前景——基于与日美科技争端的比较》，载《学术论坛》2022年第3期，第30页。

[4] JaceDela Cruz, “US Adds 36 Chinese High-Tech Companies on Trade Blacklist,” *Tech Times*, December 16, 2022.

[5] 李恒阳：《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5期，第84–96页。

[6] 尹楠楠、刘国柱：《塑造大国竞争的工具——拜登政府科技联盟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7页。T-10联盟，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芬兰和瑞典；T-12联盟，就是在T-10联盟的基础上增加印度和以色列。

干扰中国与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等的科技合作。

第四次工业革命既给中东国家带来了战略机遇，也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对此，沙特、阿联酋、埃及、以色列、土耳其等美国盟伴拒绝将科技合作问题政治化，重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数字经济、5G技术、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双方合作成果斐然，亮点纷呈：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高新技术转移与科技合作交流，探索中阿科技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帮助埃及建设超大规模的光伏产业园——本班光伏产业园区；中国与以色列在常州、广州和上海等地的高科技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生物岛、创业园建设等皆取得阶段性成果。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沙特，并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国与海合会峰会，科技合作成为中阿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沙特和中国有关公司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涵盖绿色能源、光伏、信息技术、云服务、运输、物流、医疗等多个高科技领域。^[1]

综上，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各国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的对象。拜登政府调整和重塑中东同盟体系，从过去偏向军事的“冷战型同盟”向侧重长期博弈、更加综合全面的“竞争型同盟”拓展，从“保护盟友”转向“提升盟友能力”，依赖以色列、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区域重点国家来保障自身利益，将盟友推向同中俄等大国竞争的前台。^[2]然而，中东国家不愿意成为大国的代理人，不希望看到中东沦为大国的竞技场，故在大国竞争中保持超脱政策。面对乌克兰危机，除叙利亚倒向俄罗斯、以色列偏向美国外，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不想充当大国的“马前卒”，为大国火中取栗。在俄欧能源博弈过程中，中东产油国不屈服于域外大国压力，在“欧佩克+”框架下继续同俄罗斯合作，坚持石油不增产政策。同时，他们

[1]《在中国，海湾国家找到了做生意的理想伙伴》，载[阿拉伯文]《海湾新闻报》2022年12月14日。

[2]刘畅：《拜登政府中东政策框架初探——内容、动因、制约》，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6期，第53页。

反对将科技合作议题政治化，即便受到美国施压，也不愿意中止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三、从安全到发展：大国竞争下中东国家的政策转向

大国战略竞争下，中东国家顺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潮流，趋利避害，增强外交战略、治国理政和经济增长的韧性。中东国家着眼于数字经济和新经济，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如阿联酋《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2031》《阿联酋数字经济战略》《数字阿曼战略 2030》《巴林数字政府战略 2022》《卡塔尔数字政府战略 2020》《新科威特愿景 2035》沙特《2030 愿景国家转型计划》和《国家数据和人工智能战略》等。^[1]中东国家积极借鉴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改革发展的经验，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来带动国民经济的腾飞。

（一）在政治领域，中东国家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9·11”事件后，美西方认为专制是中东地区冲突频发的根源，希望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建立公民社会、组建多党政府、实现媒体自由等促进地区和平，但乏善可陈。经过十几年的动荡与冲突，中东国家意识到发展才是解决中东安全和冲突问题的总钥匙；地区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造成持续冲突的根源。因此，各国政府主张从民生治理出发，自下而上、由易到难，推动中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青年就业率，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消除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东国家普遍奉行外交多元化战略，一方面与美西方维持传统安全与防务合作关系，巩固合作存量；另一方面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合作增量。中东国家不愿意成为大国竞

[1] 郭晓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与路径选择》，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25页。

争的牺牲品，而是希望扮演“第三种力量”。各国的战略自主意识提高，平视世界的信心增强。

中国成为中东国家构筑多元政治伙伴的重要一极。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沙特、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时任外长王毅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联合国大会等契机，与中东多国外长就战略、产业、项目对接进行深入交流。12月7—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访问沙特，举行了首届中阿、中国与海合会、中国与沙特“三环”峰会，开启了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三环外交”，取得圆满成功。^[1]此次峰会级别高、规模大、议题广、合作实、领域新。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成功访华，体现出中东国家多元伙伴战略，为中东地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在能源领域，中东国家积极提高国际话语权

中东石油储量占全球储量的60%，天然气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45%，能源储量和生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2]欧佩克作为石油卡特尔，实际上是与西方石油寡头进行油价博弈的产物。近年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成员国在石油生产和油价稳定等方面积极合作，形成了“欧佩克+”机制，在国际油价博弈中发挥杠杆作用。通过扩容，“欧佩克+”成员国的市场份额从34.7%提高到54.1%，这使其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博弈能力明显提升，也让沙特等产油国不再受制于美国，能够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来制定产量政策，阻止美西方石油巨头公司垄断石油定价权。^[3]

[1] 习近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0日，第4版。

[2] FabioIndeo, “East–West Asian Energy Relations: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RotemKowner, P.R.Kumaraswamy, and YoramEvron, eds., *East West Asia Complex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From Bilateral to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s*, London: Routledge: 2023, p. 127.

[3] 李坤译：《沙特阿拉伯的欧佩克政策：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阐释》，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6页。

近年来，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成员国，与沙特为首的欧佩克成员国相互配合，在二十国集团等全球舞台上深度合作，“欧佩克+”机制不断完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以能源合作为抓手推动与中东国家合作，欢迎中东国家坚持中立政策。在美阿峰会等多个场合，美国多次敦促中东国家与西方保持步调一致，但多数中东国家不愿唯美西方马首是瞻。沙特不顾拜登政府的警告，执意与俄罗斯在“欧佩克+”框架下加强合作，强调根据市场化原则和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能源政策，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石油增产要求，就体现出“欧佩克+”的韧性。

在全球能源博弈过程中，中东国家抓住契机，获取新能源技术，实现新能源革命。近年来，中东国家纷纷提出能源转型计划，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如2016年沙特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仅为0.1%，到2030年该比例有望提升至30%；阿联酋通过打造马斯达尔城、马克·图姆太阳能产业园两个重大项目，展现出能源转型的壮志雄心；到2035年，埃及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将提升至42%；摩洛哥计划到2030年将清洁能源的比例扩大至52%。^[1]美、俄、欧和亚洲新兴大国领导人为获得支持，纷纷承诺向中东国家提供先进的民用核能、太阳能、氢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因此，大国战略竞争客观上有利于中东国家获得新能源技术，推动其实现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在乌克兰危机和国际能源危机背景下，中东国家还加速推进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开发。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田主要位于黎凡特盆地与尼罗河三角洲盆地，已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约3.5万亿立方米，原油可采储量达17亿桶。^[2]希腊、塞浦路斯、埃及、法国、意大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八国于2019年1月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总部设在埃及，美国、

[1] 张锐、岳锋利：《能源转型背景下阿拉伯电力一体化的进展与阻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3—104页。

[2] 《六大战略突破：扫描近十年中东—阿拉伯国家能源开发、合作与治理》，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927570。

欧盟和世界银行为观察员。^[1]土耳其和利比亚因被该论坛排除在外，故于2019年11月签订东地中海划界协议，并制定了联合开发天然气的双边框架。由此，两大阵营围绕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的规则展开竞争。鉴于国际油价上涨，世界石油巨头尤其是欧洲油气巨头加大对东地中海油气的开采力度，拟建立从中东经希腊到意大利的天然气管道，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2022年7月，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在开罗举行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发表成员国联合声明。12月，埃及总统塞西签署了确定埃及西部同利比亚海上边界的第595号令^[2]，引发利比亚的强烈不满。而随着土耳其与以色列、埃及等关系回暖，中东国家有望共同开发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

（三）在国家治理领域，中东国家从安全本位到发展本位，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21世纪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202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1.19—1.24亿人，全球就业岗位减少了2.55亿个，饥饿人口增加了0.83—1.32亿人，失学儿童和青少年增加了1.01亿人。^[3]全球贫困问题、失业问题、饥饿问题、发展倒退问题等日益突出，人类面临的发展任务相当艰巨。

发展动能不足是全球贫困问题的主要根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显示，在109个受调查的国家当中，全球“多维贫困人口”（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opulation）达13亿，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21.7%，其中一半为18岁以下的儿童。^[4]中东是全球安全与发展的短板，

[1] ZenonasTziarras, *The New Geopolitic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ilateral Partnerships and Regional Security*, Nicosia: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9, p. 5.

[2] 《利比亚外交部对埃及单方面划定两国海上边界表示反对》，光明网，2022年12月17日，https://m.gmw.cn/toutiao/2022-12/17/content_1303227223.htm。

[3]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1*, 2021, p. 2.

[4]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1 : Unmasking Disparities by Ethnicity, Caste and Gender, 2021*, UNDP, pp. 4-5.

是全球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重点难点地区。2019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5.4%，中东国家是其2倍，在各大区域中居于首位；2020年中东国家失业率上升至11.7%，在全球各次区域中排名最高，失业等发展问题是摆在中东各国面前的头等任务。^[1]

长期以来，西方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把中东视为“被治理”和“被改造”的对象，用西方价值观改造中东，用西方的标准治理中东，在反恐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安全治理上滥用武力，以军事联盟求绝对安全，打着公共产品的旗号满足私利，在发展战略上加剧了中东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此外，美西方以“支持独裁论”“债务陷阱论”“投资腐败论”“环境破坏论”“侵犯人权论”为借口抹黑新兴大国，并提出“蓝点网络计划”（BDN）“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等，对冲新兴国家的发展倡议，干扰中东国家关系的缓和，阻碍了中东的发展进程。

“阿拉伯之春”爆发十余年来，中东国家对内陷入教派争端，对外沦为各国的代理人，错失发展机遇。随着中东国家关系的改善，求和平、谋发展日益成为各方的共同诉求。战争与冲突的“旧中东”已成为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初现端倪。中东现代化发展道路表明，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难以在中东落地，中东地区的主要症结不是民主赤字问题，而是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问题。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热点问题有所降温，发展迎来新阶段。

（四）在气候治理领域，中东国家积极制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

1990—2004年，中东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球第三位，增速超过全球平均速度的3倍。^[2]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

[1]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1*, 2021, p. 42.

[2] MeredianAlam and IzniAzrein Noor Azalie, “Greening the Desert: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and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n the GCC States,” in MdMizanur Rahman and Amr Al-Azm, eds, *Social Change in the Gulf Region: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pringer, 2023, p. 496.

其和埃及为代表的中东国家提出了各自的生态治理理念，以新经济、新基建、新能源、新科技、新产业为推动力量，助力生态环境改善。2022年，阿联酋等中东多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时间表；埃及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西方领导人出席；沙特推进建设“绿色沙特”“绿色中东”目标；阿联酋将承办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述举措体现出中东国家在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领域的合作态度。

（五）在民生领域，中东国家积极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

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约占全球小麦出口的1/3，分别是全球小麦第一大和第四大出口国。乌克兰危机不仅直接推高了全球粮价，而且影响全球粮食供应，对全球粮食进口国造成极大压力。对于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进口的中东国家来说，乌克兰危机增大了它们的粮食安全压力和财政压力，如埃及小麦价格在危机爆发一个月后上涨了50%。^[1]与埃及相似，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权安全离不开西方，粮食安全离不开俄罗斯。海湾阿拉伯国家90%粮食消费依靠进口，而俄乌是其粮食进口主要来源地。粮食问题不解决，中东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因此2010年底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被称作是“大饼革命”。乌克兰危机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中东各国正未雨绸缪，积极维护粮食安全，巩固社会稳定。

结语

大国战略竞争下，美国组建“复合联盟”，对俄罗斯实施地缘政治围堵，

[1] 王林聪：《从俄乌冲突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出路》，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第26页。

对伊朗实施军事围堵，对中国展开科技围堵，借此维护并扩大美国在军事、安全、科技等领域的优势。欧洲大国积极与中东国家建立能源伙伴关系，减轻对俄能源的依赖。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欧处于攻势，具有存量优势，如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59%以美元的形式存在；国内生产总值居前15位的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在萎缩，而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却在不断增长。^[1]新兴大国具有增量优势，全球力量中心向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转移。美国加大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改革国内科研体制，实施“小院高墙”，对新兴大国实施综合性压制。

大国在全球的地缘、能源和科技竞争对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多年的经营，美、俄、欧等传统大国及大国集团在中东拥有空间优势，形成政治、军事、制度等多重影响力；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具有时间优势，在中东后来居上，形成追赶态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不断累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中东影响力不断下降过程中，美国政府不去反思自己错误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尤其是不去反思耗资数万亿美元、在中东发动多场战争的错误政策，反而把霸权衰落归咎于新兴大国的“不正当竞争”，甚至坚持“美国感冒、世界吃药”的错误逻辑，执意开展大国战略竞争，破坏了多边贸易，恶化了中东的发展环境。

当前，美、俄、欧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却加大对中东的外交投入。美俄争取盟伴的支持，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欧洲大国为减少对俄油气依赖，不断提升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水平；印度积极拓展中东市场，在印太四国机制和中东四国机制中发挥桥梁作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相互借力，成为大国在中东博弈的新特点。美欧积极构建中东伙伴关系网络，促进能源问题和科技议题“政治化”，以安全为借口打压新兴大国，将盟伴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迫使盟友与美国一道对中、俄、伊朗、叙利亚“脱钩”。

[1] Joseph S. Nye, Jr. "Peak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3, 2023.

大国在军事上从中东抽身，客观上推动了中东地区对话与和解进程，求和平、促发展成为各国的心声。从2022年年初的中国“中东周”到年末中阿“三环峰会”，再到2023年3月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所带来的中东“和解潮”，中国与中东整体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与美、欧、俄在中东选边站不同，中国从责任论出发，主张大国之间相向而行，不冲突、不对抗、不结盟。中东是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内涵的实践舞台。在中东格局演进过程中，中国扮演建设性角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强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与世界大国在中东求同化异、管控分歧，有助于跳出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重构大国协调关系，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展望未来，中东国家将在变局中构建新格局。土耳其迎来建国百年和总统大选；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因推动司法改革而引发全国抗议；伊朗将积极应对内外部挑战，努力走出困境；阿拉伯多国实现了新老交替，将围绕各自中长期发展愿景，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东国家以改革促发展，从顺势到谋势，积极应对安全危机、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与外部世界将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更加稳定的安全、政治、能源、科技与发展格局。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国际权力格局大分化时期，促进中东国家间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中东地区福祉，也有利于造福全世界。

【收稿日期：2023-01-05】

【修回日期：2023-02-27】

（责任编辑：邢嫣）

ABSTRACTS

- 01 Effects and Dynamic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2022)**, by Gao Fei, Vice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nd Wei Jianxun,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was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such as decli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obstructed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volatile commodity price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nd obstru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China maintained strategic resolve and firmly promo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showing great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and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stabilizing and recover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made great progress despite the epidemic because it is a new type of development-oriented globalization advocated by China and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high-standard, high-efficiency, high-quality and high-resilienc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will contribute more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 29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ontext of Major-country Strategic Competition**, by Sun Dega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nd Zhang Jieyi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the global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has intensified,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erms of security, politics,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ecurity level, major powers are less able and willing to wage proxy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is no longer the main global conflict.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seen a trend of easing relations, moving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alogue, and seeking to build a new Middle East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is more stable, balanced and beneficial to all.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US and Russia are locked in fierce competition fo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amid the protracted Ukraine crisis, which has made the Middle East a “new middle ground”, but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re reluctant to take sid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t the energy level, the game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has mad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shift from “one-sided” energy export to Asia in the past to “East-West equal importance” in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energy consuming powers in Asia and Europe. At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couraged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to decouple from China and cut supplies, but they oppos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 and do not want to follow the l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 52 Diversity and Competition & Cooperation: The Change of Major Power Leadership Model in Climate Governance**, by Yu Hongyuan, Director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Divis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ang Xiaora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Law,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Li Kunhai, Lecturer,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In the context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leadership competition in climate governance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gained a certain first-mover advantage in the new round of climate game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new climate policies to consolidate or expand their own leadership in climate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other major